

民族主义、现代化与国家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诠释与反思

冯 静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市 200433)

摘 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成为国家的变革目标,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也是民族主义促迫下的产物。这与西方以资本推动的现代化的不同路径,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新中国现代化中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因素。而正确认识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理性地处理民族情感,是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民族主义;现代化;国际环境;非理性;反理性

中图分类号:D6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1-0102-05

20世纪对于中国是个革命的世纪。人们也习惯于从革命与现代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在革命与现代化方面,除了亨廷顿与巴林顿·摩尔所做的比较研究外,在中国以“革命的话语”来考量的中国现代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现代化亦不乏其人,如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1]和刘小枫的《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2]。这些论著对于理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关系贡献颇丰,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有很大启发。但是,中国革命对现代化发生重大影响的背景因素——民族主义,没有或者重视不够。本文试图从民族主义因素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1949—1978年这段时期的现代化。

现代化这一源于西方的概念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广泛使用,虽然由于其内容的含混和矛盾遭到广泛的批判,但作为解释社会变迁的宏观概念,尚无其他替代性的概念出现。但由于西方的现代化是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下推动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便成为现代化的前提假设。为此,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产生,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观念:一派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内生的,从明朝中后期既已出现其萌芽,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有:易劳逸、彭慕兰、马若孟等;另一派持外生型观念,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型”,主要有费正清、费维恺、白吉尔等。但是,在1840年以前,即使中国存在商品经济,推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规模的资本运

动远未形成。帝国主义的侵略,则使民族独立和民族富强成为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而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以其科技与工业的优势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如果说,帝国主义催生了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偏狭,那么,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科技则是自帝国主义侵略后第一次在中国成为自觉的目标。罗志田教授以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的实际和隐约的控制力量来解读民国政治,认为外国在华存在是民初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特征,认为这一“他者”不仅意味着御外的一面,也与国内的实际政治运作关联密切^[3]。救亡和富强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救亡是帝国主义侵略下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而富强,当时的目标和示范则是现代西方的现代化产生的国家实力的强盛。这二者在社会进化论的思潮下水乳胶合。张信在对河南北部和西南部的比较研究中,以社会演变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揭示表明,中国走的是一个不经过工业化而达到现代化的特殊现代化之路,揭示了包括外国经济利益侵入等诸多社会条件如何推动了个人、社会和现代国家层面方面的现代转型^[4]。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文化优越感和长期大一统帝国的历史实践,使民族自豪感与民族意识有深厚的心理积淀。但建立在华夷观念和帝国天下秩序上的民族情感,与现代民族主义有很大差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舰队突破广州虎门要塞,沿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的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

* 收稿日期:2006-06-15

作者简介:冯静(1972-),女,四川邻水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政治社会学和中国政治等。

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5]。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世纪交替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传入我国的。据考,梁启超是“民族”一词的最早引用者,清末维新派和我国在外留学生最早将“民族主义”一词引入中国。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爱国志士,都立即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并把民族主义与解决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6]。

在民族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带来的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瓦解了,移植了新的生产方式。铺设铁路、创建银行、开设电报、开办厂矿、强化贸易……,所有这些便利西方殖民掠夺和控制的手段,使分散在广大领土上的人们有了相互联系和沟通的工具和纽带。铁路使原来彼此分散的人群连接起来,促成了民族团结的实现。电报不仅使国内各地加强了联系,也使不同的民族彼此连接起来,而经济贸易关系,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这一切都扩展了人们的眼界,使“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在人们的意识中出现。而为了救亡兴办的新学中,在出版报刊、开办广播等活动中,连同民族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意识得以广泛传播。清末以来出国游学的留学生则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传播的重要主体。正是对中国的羸弱的深切感知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反应性的团结,从而感到国家要比其省籍和宗族更加重要”^[7]^[21]。民族危亡激起了团结一致对敌的决心;西方思想和意识的引进和传播,给他们提供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其中心内容都体现了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从器物到制度再到价值观念方面向现代转型的努力。

从鸦片战争开始,所有的统治者都被迫面临着西方侵略对国家主权的侵夺,在“变则通,通则久”的逻辑下,都被迫变革,实施现代化的各项政策。而其变革的依据,首要的是西方入侵造成的千年未遇之变局。所以,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其倡导最力者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其动力则是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的情怀。而掌握政权的统治者迫于内外压力所做的现代化的变革,是其政治正当性的重要内容。清朝的统治者被迫开咨议局、兴办现代工业以拯救危局;北洋军阀政府则以亲英美、亲日相互攻讦政敌,以至于余英时说,百年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就会失败。”^[8]甚至连中国共产党能够最终战胜国民党取得胜利,都被设想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民族主义利用的成功。这一理论被事实驳斥,正如马克·塞尔登所言:“如果农民民族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是反叛的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政府成

为主要的‘受益者’?”^[9]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深入人心,组织上和军事上的成功都是其中的因素。但极其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支撑性力量。而这一支撑性力量在以往是空缺的。清政府被迫做出的现代化变革,危及到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因此不能成为担当的主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破了王朝循环的传统路径,建立了现代形式的政府,但社会结构如故。社会下层缺乏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力量,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倡导和实施。但中华民国时期的乱局,造成军阀分裂割据,政治权力分散。即使是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也很有限。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基础,都和大地主、官僚资本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从主观意愿上还是在客观能力上,他们都不能成为现代化的支撑性力量。这是近代中国因应民族主义有实现现代化迫切要求却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二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主权独立和治权统一。似乎激发民族主义的因素消退了。但是,西方帝国主义虽然不能再侵夺中国主权,但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是孤立和敌视的环境仍然蕴含着深刻的危机。历史的发展,使中国人不可能再回到闭关锁国以自保的状况。天朝帝国的幻梦破灭后,列强环伺的中国是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对于民族所处环境的基本认识。这一意识并不随着新中国赶走了外国入侵者而消失。相反,这一意识在新中国领导人头脑中持续存在并在某些时候不断加强。所以,不从整体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来考察新中国的历史,是难以正确理解其中的诸多事件的。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其依靠革命获得的合法性需要绩效来支撑,“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经验,使尽快实现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之一。面对分裂的西方世界,新中国的选择是有限的。中国要独立自主,但中国也需要资金、技术的援助和主权的被承认。在诸多历史条件和机遇下,新中国最后选择了与苏联结盟。敌与友的界限随着冷战的展开越来越清晰。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权要防止强大的盟国苏联危及中国主权,要防止敌对的欧美各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尤其是列强侵略的屈辱刚刚结束时,一个经济落后、政权不够稳固并且国际环境恶劣的新生政权,其现代化的急迫自然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对于新中国在踌躇和犹豫之间为何最终采取了“一边倒”的与苏联结盟的外交政策,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论述的:愈来愈浓厚的冷战氛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这一选择事关重大。因为作为后发现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总是裹挟着对

外挑战的回应。后发国家面临着赶超和借鉴外国的问题,能否制定出一个基本上是借鉴外国经验的大规模变革计划至关重要。而先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模式引导着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与制度选择。吉尔伯特·罗兹曼说,既存的国际关系为中国有效地向别国借鉴设置了若干障碍。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使中国人对与外国交往和对外国意图的戒心阻碍着现代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7]406}。而且,在冷战年代,中国只能接触到那些与苏联站在一起来的国家里的有限市场和技术。而苏联提供的援助是如此有限,按照中鸣岭雄的说法,只是区区一笔小款,现代化建设成败就必须依靠最大力量地汲取国内资源^{[10]286}。这使自力更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方针。

然而,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仍有许多。罗兹曼对于这些因素进行了检点:一是国际地位的改善以及由此萌生的民族自豪感;二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的本钱;可靠的常备军、经验丰富的外交使团、债务废除、受过西方教育的专家;三是适合于现代化的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以及政治权威合法性基础较好;国家对于社会的强大渗透能力等^{[10]286}。然而,这些所有的条件都只表明具备实现现代化的种种物质基础,而要真正发挥效力,则需要政府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新中国政府完全具备了这一点。这是因应民族主义的要求,而敌人并非完全是假想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新中国的建立成为一度停顿的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新中国现代化一度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包括中央集权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社会整合方面政治控制与协调能力的大大提高,重工业和总体国民生产的高速度增长,卫生条件的大大改善,国民识字率的提高、新的生活结构的建立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成就。在经济方面,到1957年为止,也有极大提高。1951年比1950年财政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8.9%,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长分别约为3.8%和18.7%^{[10]161}。而这一持续增长的势头却被激进的大跃进所中断,新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第一个危机。

我们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以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崩溃为起点,现代化开始面临困境,而大跃进及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现代化受挫的直接表现,1966年的文化革命则使现代化的进程一度中断并在某些方面退化。截至1966年,中国现代化的受挫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造成的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没有明显提高,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改善;政治上,人员录用及选拔上没有建立合理的制度,党的官僚机构、官僚主义难以克服,权力关系的个人化以及运作缺乏程序化的制度,上层统治精英的分裂,政策的反复无常;社会生活方面,城乡差异、工农差别加剧,自上而下的整合方式

并未使社会整合尤其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程度提高,由户籍和工资等级确立的社会等级加深等。大跃进使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而1963—1965年的调整巩固的政策并未稳固地贯彻,国内的矛盾伴随着国际上的孤立,为一直潜伏的左倾激进的路线打开了缺口。党的上层领导对于发展路线的分歧,加上少数领导人物的野心,终至酿成以社会全面动荡、对抗与停滞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对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何以发生,有着种种的解释。主要的观点是:(1)斯大林模式的缺陷。这是最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和经济上高度集中计划的体制造成个别领导人的专断和错误不能被校正,经济上的集中计划使社会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力,社会自主性的缺乏使经济和政治发展缺乏活力;(2)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革命是激烈的社会改造,与推翻罪恶的旧社会相连的,必然是对于一个完美的新社会的向往。革命在宣扬暴力手段的同时包含着有关民主和民族内容的社会变革的种种许诺。对人世界完美性的追求,包括财富平等、人民民主、人性改善。执行决策过程中的群众动员,对于“反革命”与“阶级敌人”的批判,是使民众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的最佳方式。当道德国家的追求不能实现时,以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路径依赖来颠覆现有的秩序也就成为合理的选择;(3)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准备不足;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作为制度先进性的指标,过快地实现三大改造和盲目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化也缺乏系统的认识,把现代化等同于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的强盛。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4)缺乏有效运作的制度体系。中国社会特有的政党、军队与阶级三位一体的强大力量难以孕育出理性的制度体系,政治权力的运作没有制度基础,而是靠个人化关系。费正清分析到,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于具体行政事务的中立态度,使他成为政策分歧的裁决者,他的威望成为党内团结的关键。而一旦在大跃进后毛的威信受损,并日益牵涉到具体政策中去时,党的团结就难以维系,为政治钻营与派系斗争提供了土壤;(5)共产党以及政治上层矛盾不能在制度内缓与解决;费正清强调,建国初期现代化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模式和领导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10]148}。苏联模式提供了一个有具体规定的目标和完成方式,使现代化发展路线上的矛盾有所缓与减小。领导层的团结不仅使统一的决策能够在各级负责人中迅速贯彻,而且由此形成的领导集团的权威和信任的气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或承认党纲的热情^{[10]56}。而大跃进后苏联模式提供的一致认同的消失,对于未来发展策略的分歧,发

挥科层制的效用和遵循群众动员的不同手段冲突,在党的集体领导被破坏的情况下,难以有效解决而表面化。而某些野心家的利用更加深了这种分裂,致使1962—1964年的经济社会调整措施难以全面开展并持续贯彻。国际形势的严峻和毛泽东对于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偏差及其在国内威信丧失,组合在一起触发了文化大革命。

这所有的解释都从某一个方面有说服力。但是,从这些事件的背后看到的人们称为“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因素,一直令人们困惑不解。

中国政治中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因素,人们一直有着各种解说:君主专制的积习、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反智倾向、伦理与政治合一的传统政治特点,以及“革命”意识形态的承袭、社会主义思想的空想成分、毛泽东个人的浪漫主义情怀等。这些说法都有其解释力和合理性。但如果抛开民族主义这一“酵素”所起的作用,仍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三

如前文所述,近代中国有现代化的许多因子,这些因子是被民族主义所激发而酿成国家有意识的现代化举措。即使到了20世纪中叶,资本的力量也仍然弱小,没有能够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民族主义的激发下由国家发起的社会变革。这与西方以资本推动的现代化的不同路径,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新中国现代化中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因素。其主要特征是:

(一)国家本位而非个人本位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化是在资本推动下从下而上地推进的。而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推动现代化的发展。而国家要推动政策的实现,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必须从社会汲取一切资源,这使国家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成为必要。人民公社化、城市单位体制以及企业国有化政策,加上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网络,使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成为可能。因此,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并非盲目模仿苏联模式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要求。这一体制在初期体现出极高的效率,使国家能够集中一切物质和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即使在奠定了现代工业体系后,这种现代化模式也仍然缺乏社会内部的推动力。而这种由国家推动的工业化,唯一可以汲取的资源来自农业。掠夺农业以建立工业是不得已的策略,而这种策略造成的结果不是现代社会的城乡差别的缩小,而是工农差距的扩大。这与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当农业在人口的压力下增长乏力之际,工业的增长也受到影响。现代化的可持续性缺乏。而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民族整体利益面前也自然受到限制。

(二)非理性的政治运作与政治文化

现代化作为一个发生在各领域里的涵盖一切方面的变

化,在表现最突出的经济与科技进步的背后,是理性的态度与精神。正如詹姆斯·奥康内尔所指出的:所谓现代,就是一种观念,它给予各种成分以形态^{[11]24}。“现代化是探索性和创造性思想态度的发展,它既是个人的思想态度,也是社会的思想态度。这种态度隐藏在技术和机器使用的背后,引起个人之间社会关系产生新形式。”“构成现代性的态度、工具和结构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这种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11]32-33}而在民族主义的促迫下由政府领导的现代化,缺乏有效的利益机制推动,政府推动政策实行最重要的依靠民族主义的号召,这从“超英赶美”的各种口号中得到了反映。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在其初始之际,民族主义打碎了传统的、陈腐过时而束缚人的社会秩序,并以人类的尊严感、以参与历史和管理自己事务的骄傲和满足感填充着追随者的心灵。这种使人获得解放的感情正是19世纪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的特征,正如今天(20世纪中期)在亚洲和非洲一样。”^[12]广泛的群众动员正是依靠了这样的激情和意识。

(三)效率与正义

在民族主义的诉求下发展现代化,一个主要的内容是以国家的强盛保障国家的安全。这种民族主义,对外表现为以论证自身的正义和敌人的非正义获得正当性。这一内容和被列宁改造过的民族社会主义有极大的亲和性彼此吸收和强化。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并非强调国家主义,而是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强调民族自决权。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列宁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向外,自证制度优越性,向内,以民族解放为口号进行政治动员。要自证其制度优越性在建国后却面临着困难:经济上的优越性难以体现;政党、国家、社会权力一体化导致社会高度政治化,获取政治权力和权力斗争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唯一途径,经济、文化等其他价值依附于政治权力,其结果造成罗伯特·达尔所言的累积性不平等。政治上的优越性更难体现。冷战的局势和中苏交恶造成的孤立带来的紧张和压力,使领导人把一切对当前社会存在的不满视为挑战和敌视,这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深层因素。而在自证其当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价值取向,对道德国家的诉求压倒了一切,毛泽东和普通民众心目中的道德国家形象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等级分别,没有贫富差距的国家。平均主义成为分配的主要原则。而当姓社姓资来订级别和城乡差距仍然造成了人与人的不平等时,设想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并以推翻官僚体制、发动“大革命”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便成为合情合理。而一个与国外帝国主义有关联的资本主义的存在使这一危险更为严重。盲目的激情裹挟着种种不满,足以冲破一切秩序。对人性充满了解和悲悯的莫斯卡说:要使人们为某种事业奋斗,“必须在一定数量上融合高尚情操和

一些低劣的情感,融合贵金属和贱金属——否则这种合金就经不起磨损和破裂。”^[13]至少在文革中,这种对人性的认识是客观的。

(四)真正的敌人和假想敌

人们一致认为,毛泽东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有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在冷战时期,敌人并非是假想的,而是真实存在的。然而真实的敌人与意识中的敌人也是有差别的。从近代中国饱受凌辱的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中共领导人,“列强环伺”的意象是如此真实。而从1958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使这种危机意识更加真实。在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紧张备战状态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容许有任何的内部敌对。发动全民族的斗争以清洗阶级敌人,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的必然反应。而社会的“泛政治化”的紧张状态,是国家危机时所特有的状况。

要摆脱这种民族主义激发下的现代化路径,就需要使人们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有所改变,以新的眼光认识国际和时代形势,把民族主义的激情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社会中培育现代化的动力。这些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伟大成就。与改革开放一起出台的,是邓小平关于国际局势的认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意识中列强环伺的阴影消失了,才能坦然承认差距,实行改革开放。自证其当的迫切性消失了,市场和资本才能合法地存在并壮大,效率与正义才能兼顾,建设市场经济而非道德国家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培育现代化的社会动力,就需要个体的解放和资本的动力。在人们摆脱了强大的假想敌之后,中国才开始向资本推动的现代化逐步转化,虽然这种转型仍然具有中国的特点,但更理性的政治、更自由的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已经显示出现代化的巨大成就。

中国的现代化几起几落,构成了百余年来近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画卷。自魏源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富国强民的理

想,在一个多世纪后变成了全民族的一项宏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正确认识民族和世界,正确处理民族情感,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一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最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中国人民的现代化理想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陈建华. 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 刘小枫.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M]. 上海:三联书店,2000.
- [3] 罗志田.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自序2—3.
- [4] (美)张信.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M]. 岳谦厚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1.
- [6] 唐文全. 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7]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8] 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C]//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03.
- [9] (美)马克·塞尔登.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 魏晓明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82.
- [10] (美)麦克法夸尔等.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1] (美)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C]. 杨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 [12] Hans Koh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M]. Harper & Brothers, 1962, p. 12
- [13] (意)加塔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M]. 贾鹤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236.

责任编辑 刘荣军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ate: Explanation and Reflection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FENG Jing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bvious opinions have been reviewed and analyzed briefly. Nationalism catalyze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Modernization became the reforming objective as a result of the stirring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Modernization in Mao's age had great correlation with nationalism. The fact that it differed greatly from the modernization pushed by the capital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can explain the irrational and antiration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P. R. C before 1978. To have correct recogn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position China takes in th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ces.

Key words: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rrationality; anti-rationality